

实现边疆人民美好生活的绿色治理： 内涵逻辑、问题瓶颈与绿色路径

史云贵，罗小强

(浙江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 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治理是实现边疆人民美好生活的理性路径选择。当前，在以边疆绿色治理推进人民美好生活的进程中，还存在着绿色发展理念淡薄、GDP至上冲动、产业结构不合理、灰色空间蔓延、灰色政策滋生及发展成果共享性不足等一系列的梗阻问题。明确绿色治理理念、发展边疆绿色经济、完善绿色政策、健全共治思维、打造绿色文化、培育绿色心理、科学测评绿色质量，是以绿色治理推进中国式边疆治理现代化，进而实现边疆人民美好生活的绿色路径。

[关键词] 美好生活；边疆绿色治理；路径创新

[中图分类号] X 321；K 9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25) 02-0011-08

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是中华儿女的共同夙愿。边疆地区是主权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主权的边疆表达。边疆人民美好生活是整个中国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疆地区由于一度处于国家的“边缘”位置，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美好生活实现中的“洼地”，进而制约着边疆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进程。长期以来，学术界多从政治学、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聚焦边疆的“稳边”“固边”“兴边”等问题。近年来，一些学者从文化治边、党建治边、标语治边等治理路径来研究边疆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问题，并越来越聚焦到边疆治理现代化下的复合路径，推进边疆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进程^[1-4]。新时代新阶段，我们究竟应秉承什么样的治理理念，走什么样的治理“路径”，才可以加快实现边疆人民美好生活呢？这应是我国边疆治理现代化始终绕不开的问题。本研究从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与绿色治理的内涵逻辑出发，在厘定二者概念内涵与内在逻辑的基础上，探索人民美好生活区域实现的“边疆”场域与“绿色”路径。

一、推进边疆人民美好生活的 绿色治理的内涵逻辑

“活得好”是人类存在与发展的基本逻辑。人类历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部探索如何实现美好生活的历史。美好生活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更是一个具象概念的集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好生活应是一定时期的人们对能够满足他们所在区域的美好要素的有机集合。人类探索美好生活的实现过程，也是从理念式美好生活走向实践式美好生活的过程^[5]。新中国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是党带领人民不断寻求通向美好生活道路的历史^[6]。一般而言，人民美好生活应包括“个人物质维度、家庭和人际关系维度、国家与社会环境维度”^[7]等方面的内容。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就必须让美好生活逐步具象化与指标化，否则，人民美好生活就会一直停留在抽象的概念与理念式的乌托邦构建之中。因此，美好生活应是人们“基于一定生活标准对其当下生活状态所形成的积极的主观体验与评价结果”^[8]。作为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疆治理事关国家的兴衰荣

[收稿日期] 2024-08-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郊区绿色空间形态共建共享研究”(21AZD124)

[作者简介] 史云贵(1971—)，男，江苏徐州人，教授，博导，主要从事绿色发展与绿色治理研究。

辱。长期以来,边疆在国家“中心-边缘”的空间布局中一度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有什么样的发展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策略。进入新时代,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有效实施,边疆逐渐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与“前沿阵地”。但受历史、地理、文化等条件的制约与发展的路径依赖,边疆地区的“洼地”崛起必须要寻找能够容纳人民美好生活要素的新的空间形态,寻找新的发展动能,探求新的治理路径,不断满足边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我国国土幅员辽阔,地形地貌复杂多样,这也决定了我国边疆地区生态多样性与脆弱性并存。长期的边缘性与落后性容易让边疆地区滋生“赶超”心理与“唯GDP”冲动。但象征着生命、健康、可持续的绿色发展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遏制这种非理性的冲动。这里所说的“绿色”不仅是大自然的底色,也是国土空间生产、生活、生态的底色,除代表着生命、健康、活力等一般意义外,绿色在政治社会意义上还象征着合作、和谐、和平等丰富的治理内涵。这就让基于绿色发展的绿色治理成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路向逻辑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与现实中的可行性。绿色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治理范式,能够有效直面边疆治理中的重要问题,有效破解边疆绿色发展中的困境,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时代治理需求。新时代的边疆绿色治理是指边疆多元治理主体,在党的领导下,秉持绿色价值理念,凝聚共治边疆公共事务的绿色合力,推进边疆人民美好生活实现的一系列绿色活动^[9]。可以说,边疆绿色治理是落实边疆绿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中国特色绿色治理的边疆空间表达,是以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满足边疆人民美好生活的治理新形态。

二、边疆绿色治理中的“非绿色”问题及其对人民美好生活的影响

边疆绿色治理是全面落实新发展理念,推进边疆人民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绿色作为人民美好生活的底色,有着健康、和谐、可持续等丰富的意涵。基于绿色发展的绿色治理是国家治理绿色转型的必然结果,是新时代

国家治理的新形态。当前,在以绿色治理来推进边疆人民美好生活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着一些“非绿色”问题梗阻,这些问题与障碍如不能有效解决,无疑会制约着人民美好生活的边疆实现。

1. 绿色发展理念淡薄制约着绿色治理推进边疆人民美好生活空间整体的绿色性。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有什么样的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行动。绿色理念是绿色发展与绿色治理的行动指南。边疆高质量发展中的非绿色因素在思想意识上突出表现为绿色发展理念淡薄。作为绿色行动的先导,绿色发展理念是边疆高质量发展的绿色指南。绿色空间是绿色发展与绿色治理的空间场域,是各种绿色要素集聚的空间所在。由于理念体认落地的梯次性与滞后性,包括一些边疆地方党委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自觉认同并认真践行基于绿色底蕴的边疆绿色空间营造还有一个渐进的认识过程;一些地方政府习惯了“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思维路径^[10]。“经济决定论”在让一些边疆地区取得较大经济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不少沉重的代价。如,过度开采导致资源匮乏、“先污染后治理”导致部分边疆生态环境恶化等。国土空间治理的中心-边缘矛盾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在不同程度上面临的问题。对于一个超大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我国东、中、西部发展严重不均衡不充分,空间发展的初级性是很难跳过的^[11]。在一些急于求富的边疆欠发达地区,绿色发展理念的理論优势转化为绿色发展与绿色治理的效能,依然有着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为此,中国特色的空间差序格局决定着以绿色治理推进人民美好生活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这种时空的差异性造成了在以绿色治理推进人民美好生活的进程中,人民美好生活的边疆实现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与非同步性。

2. GDP至上的发展冲动及其路径依赖制约绿色治理推进边疆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长期以来,一些地方简单地把经济增长当作经济发展,“以GDP论英雄”一度形成了很强的路径依赖。在现代化过程中,“增长-发展”的传统范式,在解释如何从技术和方法上破解生态危机、补齐生态短板和实现绿色发展时遭遇了困境”^[12]。即

使到了大力倡导绿色发展的新时代, 在一些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指标体系中, GDP 指标还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 一些边疆地方政府依然把 GDP 的多少和增幅大小作为选任干部, 尤其是选拔主要领导干部的最重要指标。这样, 在一些迷信“GDP 至上”的边疆地区, 包括那些打着“绿色”城市在内的各种城市类型的空间规划就成为了地方政府扩容城市范围、争取大宗城市建设用地的政治口号。一些边疆城市打着建设绿色生态城市的旗号, 开发了远远超过人们理性需求的绿地或湿地公园, 实际上是变相地大搞土地财政, 助推城市无序扩张。这种重“量”少“质”的城市蔓延与恶性膨胀, 不仅与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绿色发展背道而驰,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严重侵占了城市周边的耕地良田, 对国家粮食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在边疆日益走向高质量绿色发展的今天, 绿色政府绩效评价是纠正边疆地区政府追求 GDP 偏好, 促进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重要保障机制^[13]。基于绿色发展理念的绿色政府科学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规范边疆地方政府的传统 GDP 冲动, 逐步形成以绿色动能、绿色产业等经济新形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绿色路径。实际上, 建设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绿色生态城市或城市绿色空间, 不是不要 GDP, 而是应追求绿色 GDP, 或者说是一种能够有效支撑城市绿色空间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经济。

3. 不尽合理的产业结构制约着绿色治理推进边疆人民美好生活实现的时代步伐。科学合理的产业结构是打造绿色产业、支撑城市绿色经济的基础。因此, 打造现代绿色产业结构是建设城市绿色空间的基础性工程。一些边疆地区在以绿色空间营造推进边疆人民美好生活的进程中, 现代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但是离有效支撑边疆城市高质量发展、健全的绿色产业体系的要求还存在着较大的距离。以边疆城市绿色空间建设推进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 要求有助于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绿色生态城市应是一个“人、城、境、业”有机统一, 生产、生活、生态“三态”有机融合的美丽宜居城市。为此, 建设边疆绿色生态城市必须健全边疆城市绿色产业结构, 全面彰显绿色生态城市的“三

产融合”与“四化同步”的功能。事实上, 一些边疆城市的主城区还没有完成“退二进三”等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基本任务, 不少高投入、低效能的传统工业还在主城区生产或变相生产, 大量的“五小”企业、黑作坊、黄赌毒产业链还在城乡结合部、甚至在主城区滋生蔓延, 给社会的和谐稳定与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隐患。当前, 建立健全有效支撑边疆绿色生态城市的绿色产业结构体系, 必须真正落实好绿色发展理念, 在彻底铲除边疆城市空间中各种非法产业链的基础上, 大力供给并有效实施绿色政策, 借助绿色政策体系的驱动, 构建和完善绿色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 夯实绿色产业发展的基础平台, 科学处理好承接产业链转移与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衔接和互动关系。

4. 灰色空间的蔓延制约着边疆绿色治理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绿色空间形态的营造。绿色是现代城市的底色, 也是人民美好生活的底色。任何美好空间都是建立在绿色生态空间基础上的。但在不少边疆城市生活中, 确实经常存在着“非白非黑”的城市“灰色空间”地带。“灰色空间本质上是对‘灰色利益分配权’的竞争, 进而形塑出去公共性的灰色秩序”^[14]。灰色空间“既包括责任不明产生管理空白和权力缺乏导致管理阻碍, 也包括因利益缺失而带来的管理懈怠现象”^[15]。一个边疆绿色生态城市应是一个“三态”融合的绿色空间形态。现实中, 因发展理念滞后、生产生活方式落后等因素, 边疆绿色生态城市建设中依然存在着一些“灰色地带”等非绿色的空间形态。城乡空间的现代化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治理的制度化水平。一些边疆地区制度规范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不匹配就会产生一些边界不清晰或难以定位的区域或空间问题, 边疆城市灰色地带或灰色空间由此产生。实际上, 边疆城市灰色空间的生产是“社会-空间”相互塑造的结果。如边疆城市城乡结合部突出的“垃圾村”现象就是长期以来城乡二元割裂的发展方式在城市边缘的一种空间景观呈现^[16]。如果不及时严格规制这些灰色空间, 任其滋生蔓延就会演变为黄色地带, 甚至是黑色空间, 进而严重影响着边疆城市的绿色生态, 甚至对边疆人民群众的生理和心理都会产生比较严重

的负面影响。生活在一定空间中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体认,实际上是一种心理感受与认同的问题。研究表明,城市绿色空间对个体的生理资源有较好的复愈作用,而灰色空间不仅缺乏该复愈作用,甚至还有消耗个体心理资源的可能^[17]。因此,整治灰色空间,推动灰色空间的绿化与再绿化,营造基于绿色底蕴的美好空间形态是实现边疆人民美好生活的空间诉求。

5. 灰色政策的路径依赖制约着绿色治理实现边疆人民美好生活的质量。高品质的公共政策是高效能治理的基本工具和现实要求。而绿色政策就是一种能够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高品质的公共政策。以绿色治理推进边疆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需要与时俱进地供给绿色政策。而现实中,挥之不去的灰色政策制约着边疆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灰色政策的概念源于灰色地带,指的是一些制度规范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而产生现有制度难以规范的一些政策。在“中心-边缘”结构下,改革开放以来,公共政策的供给一度具有鲜明的空间差序性,而发展速度、发展质量自东向西也呈现出鲜明的“涟漪”效应。当北上广深等东部最发达的城市早已实现了高质量发展,并通过“腾笼换鸟”的方式凝聚高科技的绿色产业时,广大西部边疆地区还处于承接东部地区传统产业链转移的工业化中前期。由于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边缘性与滞后性,一些灰色地带依然大量存在,并基于灰色地带衍生出一些游离于法律边缘的灰色政策。基于灰色地带、灰色政策的“灰色收入”在一些边疆地区依然大行其道,这尤其表现在一些边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传统资源依赖上来。为刺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一些边疆地方政府在探索城市绿色治理过程中对一些灰色地带、灰色政策、灰色收入在政策上确实不好准确拿捏,甚至还把灰色收入作为刺激干部干事创业的重要工具。国家有关部门也一度强调,要尽可能“规范灰色收入,逐步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18]。灰色政策的存在与潜在运行,会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边疆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绿色性、公平性与可持续性,进而制约着边疆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进程。

6. 共享性不足制约着边疆绿色治理实现人

民美好生活的幸福感。共享性一般是指一种事物或服务能够被多人共同分享的能力或水平。因此,共享性是边疆城市空间绿色性的重要内容。美好生活是一种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型的幸福生活,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人民政府的使命决定的。绿色意味着生命、健康、合作与共享,通过边疆绿色空间生产与治理来实现的人民美好生活是中国特色的共享型的绿色生活。中国特色的共享型绿色生活具有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分段共享的特征。“全民共享”指每一个合法的公民都应该也能够依法分享;“全面共享”是指共享的要素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共建共享”意味着“共建”与“共享”密不可分,共建是共享的前提,共建是为了实现更好的共享;“分段共享”是指鉴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地貌复杂多样、空间的差序格局与治理的“中心-边缘”结构决定着美好生活的共享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分段共享也说明共享是一个历史过程”^[19]。边疆民族地区区位优势与发展的先天不足,揭示了边疆区域美好生活要素的共享性不足。

绿色城市空间之所以能够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空间载体,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以绿色空间为载体的生活是一种高品质的幸福生活。幸福生活与美好生活是高度一致的,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在以边疆城市绿色治理提升幸福指数、推进边疆人民美好生活的过程中,一些建设中的边疆绿色城市还普遍存在着共享性不足的现象。边疆地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不够,边疆城市公园、绿地、绿道等公共绿色空间不足,绿色空间被圈占、挤占的现象时有发生。共享性不足还突出表现在一些边疆地区发展主体打着“共享”的旗号,实际上追求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为此展开恶性竞争。由于丢掉了初心与责任,在一些边疆绿色空间共享活动中就出现了诸如“超大规模绿地”“共享单车坟场”等事与愿违的结果。为此,要切实按照共建、共治、共享的原则,突出边疆绿色生态城市空间的公共性与共享性,完善边疆城乡四通八达的“绿色”交通网络,打通服务边疆城乡人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同时,要按照现代街居制的要求,开墙破篱,打通边疆城市绿色空间的毛细血管,畅通

边疆城市绿色空间的绿色通道与绿色脉络, 聚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边疆城市绿色空间新形态。

三、绿色治理助推边疆人民美好生活实现的新路径

绿色作为美好生活的底色^[20], 也是边疆城市空间的底蕴颜色。探索更适宜的城市空间形态本质上是为了寻求更加美好的生活。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无疑都要走基于绿色理念的绿色发展之路。新时代的绿色发展早已超越了经济绿色发展的范围, 是全方位、全过程、全要素绿色化的路径^[21]。因此, 必须“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22], 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而绿色治理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型的根本保证。新时代的绿色发展与绿色治理是战略与战术相辅相成的关系。新时代新阶段, 应以绿色生态城市为绿色空间载体, 从绿色经济、绿色政策、共治逻辑、绿色文化、绿色心理、绿色质量等方面实施一系列的绿色治理举措, 不断满足边疆人民美好生活的绿色需要。

1. 发展绿色经济, 夯实实现边疆人民美好生活的经济基础。任何时代的美好生活都是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一个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产业, 产城融合是城市绿色发展的基本前提。从绿色治理视角来看, 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的经济应是绿色产业支撑的绿色经济。培育绿色产业、健全绿色产业体系是发展绿色经济的根本。为此, 要在边疆地区“大力推动钢铁、有色、石化、化工、建材、造纸、印染等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上马”^[22]。在此基础上不断培育发展绿色经济的新质生产力、新形态与新动能。欠发达的边疆民族地区要把打造绿色经济的重点放在有序土地流转的基础上, 大力发展现代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旅游, 聚焦边疆农产品的“新”“土”“特”, 大力扶持现代农业龙头企业, 着力提升农产品的生态价值, 打造边疆绿色生态产品营销网络, 全面推进“农-超”对接, 健全边疆地区农产品流通体系, 聚力提升边疆农业产业化、生态化与品牌化。而营造有利于发展边疆绿

色经济的政策环境是以绿色经济推进边疆人民美好生活的关键所在。

2. 以绿色政策驱动绿色产业为实现边疆人民美好生活提供坚实的政策网络。绿色政策是实施绿色发展与绿色治理的基本工具。能够有效支撑人民美好生活的绿色经济, 只能通过党和政府绿色政策的有效驱动来实现。“绿色政策是以绿色政府为基础的多元政策主体, 以绿色价值理念为引导, 全面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全面、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活动和活动过程”^[23]。有了秉承新发展理念和生态文明思想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公共政策的“绿色性”。通过全面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深入贯彻“两山”理论, 借助绿色政策实现一个产业链就是一个生态链, 进而产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链。中国特色绿色政策驱动绿色经济的美好生活实现, 需要在党建引领下, 实现产业链、人才链、生态链、价值链的“四链同步”。借助“四链同步”, 实现产业成链、产业成片、产业成圈, 真正形成绿色产业链与绿色产业圈, 不断提高产业和产品的全生命周期, 以产品的绿色性与高质量不断提升边疆绿色产业抗风险的能力。要在加大绿色政策供给与实施的基础上, 不断“完善绿色转型的政策体系”^[22]。以绿色政策、绿色产业驱动绿色经济为基础, 不断健全绿色政策体系与运行机制, 进而形成有效支撑绿色经济的绿色政策网络。

3. 以共治思维驱动绿色治理为实现边疆人民美好生活提供新时代的治理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们已告别了“官治”, 但要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自治”, 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共治”则是逐步实现“自治”的桥梁和纽带。绿色也隐喻着“合作”“和谐”的意涵。合作共治是绿色治理的内在逻辑与运行机制。真正的共治应是建立在人的独立性得以实现的前提下的^[2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治”, 要求多元社会主体“树立大社会观、大治理观, 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优势同政府的资源整合优势、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社会组织的群众动员优势有机结合起来”^[25]。当前, 党委政府主导的绿色治理要以生态共治为基础, 加快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环境

治理体系”^[26]。基于共治的逻辑,城市主体的绿色实践权利可通过参与城市规划、改造、分配、共享等合作活动中获得,并将“美好生活空间化”的权利理念转化为政策行动^[27]。在凸显生产、生活、生态有机统一的边疆城市绿色空间里,共治逻辑集中表现为“加快构建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绿色行动体系”^[28]。该绿色行动体系应由政府绿色领导方式、企业绿色发展方式、公众绿色生活方式三大基本要素构成^[29]。而健全推动“绿色共治”的绿色行动体系,就必须借助多元社会主体在公共领域互动中产生“绿色话语”,达成“绿色共识”,形成绿色场域文化。

4. 以绿色文化为底蕴,为绿色治理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提供厚实的生态文化基础。绿色文化起源于人们对自然界的崇拜和生态自发保护的心理学。“绿色文化是人们在创建与自然和谐共处社会的各种实践活动中所产生的、能为人们所感知和接受的、影响人们可持续发展行为的精神现象的总和”^[30]。文化与治理不可分,二者是相互影响、相互支撑的关系。绿色治理离不开绿色文化的价值支撑与氛围铺陈。培育边疆绿色文化的主旨是追求边疆地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我们要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绿色精华,推动边疆绿色文化的创造性发展^[31]。国家应“将绿色理念和节约要求融入市民公约、村规民约、学生守则、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22]。当边疆地区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绿色消费、绿色出行等一切绿色行为都成为一种自觉习惯的时候,边疆社会彰显的文化就是绿色文化。“绿色文化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目标及规划,蕴含着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先进理念”^[31]。边疆绿色治理要以绿色文化为底蕴,而浸润在绿色文化中的边疆社会主体也容易在绿色人生中享受着美好生活。基于当代绿色文化的概念和内在属性,构建绿色观念体系、绿色制度规范、绿色行为导向的当代绿色文化体系,方能架构起绿色观念到绿色行动的桥梁,有利于全社会真正践行绿色发展^[32]。新时代新阶段,要以绿色观念为引导、以绿色制度为保障、以绿色政策为驱动、以绿色话语为媒介、以绿色行动为抓手,全面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文化。

5. 以绿色心态助推绿色治理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绿色心态是心理状态的一种,具有平和、淡定、和谐等特征。心理状态是社会主体在一定情境下心理活动的综合表现。绿色的深层含义还包含着“生命、健康、平和、淡定、和谐”等社会层面的含义。“崇尚绿色生活,行有所止、取之有度,是美好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33]。因而,绿色也是一种衡量人们心态健康与成熟程度的颜色。在这个高度复杂、高度不确定的社会里面,社会主体普遍存在着“躁动、功利”等不良心态,迫切需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34]。这种绿色心态,不应有过多的计较,而是要求人们在日常生产生活中有着理性的“取舍”,不应穷奢极欲,而应去追求简约而快乐的生活。人的一生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不断地经历“顺流”与“逆流”的过程中成长。这就需要人们以绿色心态有效应对成长中的“顺流”与“逆流”。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充分彰显着绿色行为,形成绿色习惯,就容易形成绿色心态。而拥有绿色心态的人们,才会与自己和谐,才能在人生的历练中,充分体认绿色人生的价值。只有越来越多的人秉承“绿色理念”、践行绿色行为、献身“绿色事业”、倡导绿色话语、形成绿色习惯、成就绿色人生,才能真正体会什么才是真正的美好生活。为此,以绿色治理推进边疆人民美好生活,就要坚定不移地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加强公民绿色教育,培育公民绿色心态与绿色修养,凝聚起最广泛的绿色共识,汇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绿色合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文化。

6. 以美好生活质量测评为着力点为绿色治理推进人民美好生活提供质量保证。虽然美好生活是抽象的,但美好生活的时空性决定着美好生活是可以度量出来的。质量测评视角为科学评估美好生活提供了新的思维与可行性路径。“质量”是“反映实体满足明确和隐含需要能力的特性总和”,是“一组固有特性满足需要的程度”^[35]。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 QOL)是一种全面评价人们生活优劣的概念,它是“关于人们满足生存和发展需要而进行的全部活动的各种特征的概括与总结……是衡量社会发展程度的

一种标识”^[36]。边疆人民美好生活无疑是高水平的生活。而高水平的生活质量应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容纳边疆人民美好生活要素的边疆绿色生态城市的绿色生活质量应是边疆人民美好生活实现的重要保障。作为高品质的新时代美好生活, 无疑需要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来保障。离开了绿色治理, 作为高品质的美好生活就成为缘木求鱼的空洞想象。而绿色治理质量测评恰恰是以绿色治理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关键点与着力点。为此, 建立健全包括“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体系、可再生能源标准体系、工业绿色低碳标准体系”^[22]在内的绿色发展与绿色治理标准体系, 是郊区绿色空间共建共享质量测评的关键点。因此, 以促进美好生活实现的绿色质量测评为抓手, 通过科学测评推进边疆城市绿色空间建设, 就能够不断完善边疆绿色生态城市空间治理的体制、机制与政策, 进而与时俱进地推动绿色治理真正运转起来, 不断满足边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四、结 语

边疆人民美好生活与边疆空间治理形态密切相关。新时代新阶段能充分容纳边疆人民美好生活要素的绿色城市空间既是边疆绿色发展的现实目标, 也是承载边疆人民美好生活要素的载体。绿色治理是中国特色绿色发展战略的治理战术。发展绿色经济、完善绿色政策、健全共治思维、打造绿色文化、培育绿色心态、科学测评生活的绿色质量等, 是以绿色治理实现边疆人民美好生活的理性路径。

[参考文献]

- [1] 吴琼, 赵恒, 申林琛. 文化润疆: 历史基础、理论遵循与实践路径 [J]. 新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3): 68-76.
- [2] 方盛举, 刘华林. 边疆治理现代化中的党建治边方略 [J]. 云南社会科学, 2020 (3): 2-10.
- [3] 孙保全. 标语治边: 边疆治理的一种特殊方式 [J]. 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1): 52-58.
- [4] 彭庆军. 边疆治理现代化视域中的“设市治边” [J]. 中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 108-118.
- [5] 李双套. 论实践式美好生活的构建 [J]. 伦理学研究, 2020 (6): 68-74.
- [6] 朱雪微.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美好生活”的观念演进与实践探索 [J]. 教学与研究, 2019 (10): 38-46.
- [7] 王俊秀.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层次结构和实现路径 [J]. 江苏社会科学, 2020 (2): 19-27.
- [8] 郑建君. 中国公民美好生活感知的测量与现状: 兼论获得感、安全感与幸福感的关系 [J]. 政治学研究, 2020 (6): 89-103.
- [9] 史云贵. 边疆绿色治理: 概念内涵、体系构建与运行机制 [J]. 思想战线, 2024 (1): 109-118.
- [10]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195-196.
- [11] 郑杭生. 改革开放三十年: 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转型理论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9 (2): 10-19.
- [12] 翟坤周. 经济绿色治理的整合型实施机制构建 [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6 (4): 88-95.
- [13] 江永清. 绿色政府绩效研究: 逻辑起点、模型构建与技术路径: 基于绿色GDP核算的相容性设计 [J]. 南京社会科学, 2014 (1): 73-79.
- [14] 王向阳, 吕德文. 基层何以失序: 灰色空间中的分配不正义难题 [J]. 湖湘论坛, 2019 (5): 116-129.
- [15] 安颖. 组织中的“灰色空间”危害与消除对策 [J]. 领导科学, 2019 (15): 93-95.
- [16] 陶炼艳, 童昕, CARLO FERRI. 从“废品村”看城乡结合部的灰色空间生产 [J]. 国际城市规划, 2014 (5): 8-14.
- [17] 赵欢, 吴建平. 城市绿色与灰色空间复愈作用的初步对比研究 [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 2011 (3): 46-52.
- [18] 庞慧敏, 兰海燕, 王冬梅, 等. 灰色收入会不会变成“腐败小夹袄” [N]. 工人日报, 2010-03-13 (3).
- [19] 何方, 刘国翰. 共享经济与共享型社会工作体系 [J]. 浙江社会科学, 2018 (12): 141-145.
- [20] 李斌. 绿色是美好生活的底色 [N]. 人民日报, 2018-05-22 (4).
- [21] 陈若松, 余文涛. 论新发展阶段全面绿色转型的价值逻辑 [J]. 理论月刊, 2021 (5): 66-71.
- [2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 [N]. 人民日报, 2024-08-12 (1).

- [23] 史云贵. 县级政府绿色治理体系构建与质量测评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 232-233.
- [24] 张康之. 论合作治理中行动者的独立性 [J]. 学术月刊, 2017 (7): 68-77.
- [25]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 [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18: 235.
- [26]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35.
- [27] 营立成, 尹德挺. 迈向美好生活之城: 城市更新的权利维度与实践机制 [J]. 新视野, 2018 (6): 122-128.
- [28] 习近平. 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N]. 人民日报, 2017-05-28 (1).
- [29] 于浩. 加快构建三方共治的绿色行动体系 [J]. 中国人大, 2017 (2): 13-14.
- [30] 聂莉. 论可持续发展中绿色文化因素的制度安排 [J]. 学术研究, 2006 (2): 56-60.
- [31] 石文颖, 彩虹. 让绿色文化成为社会发展的一抹亮色 [J]. 人民论坛, 2018 (31): 136-137.
- [32] 杨玉珍. 绿色文化的理论渊源及当代体系的建构 [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6): 64-69.
- [33] 李双套. 论实践式美好生活的构建 [J]. 伦理学研究, 2020 (6): 68-74.
- [34] 习近平.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C]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39-40.
- [35] 王红梅. 现代工业企业管理 [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7: 142.
- [36] 刁永祚. 论生活质量 [J]. 经济学家, 2003 (6): 4-10.

Green Governance for a Better Life of the Border People: Its Connotation, Problems and Path

SHI Yungui, LUO Xiaoqia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Promoting the green governance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s a rational path to achieve a better life of the border people. However, at present there is still a series of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such as lack of awareness of green development, the impulse of GDP supremacy, the unreasonable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sprawl of gray space, the breeding of gray policies, and inadequate sharing of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Clarifying the concept of green governance, developing the green economy of the border, improving green policies, perfecting the thinking of co-governance, creating a green culture, cultivating a green mentality, and scientifically evaluating the green quality are the path to promote the Chinese-style border modernization with green governance and thus to achieve a better life for the border people.

Key words: better life; border green governance; path innovation

(责任编辑 陈蒙腰)